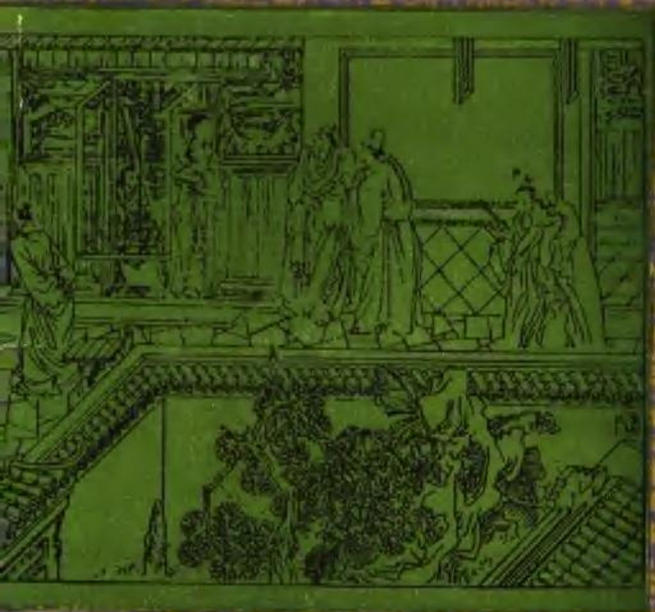


金瓶梅研究



●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
● 江苏古籍出版社

275

金瓶梅研究 (第一辑)

编者: 中国金瓶梅学会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出版: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 海门县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75

插页1 字数217,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ISBN 7-80519-184-0/I·60

定价: 5.00元

(凡遇印装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金瓶梅研究》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顾 问 | 王利器 | 冯其庸 | 吴晓铃 | |
| | 吴组缃 | 徐朔方 | | |
| 主 编 | 刘 辉 | | | |
| 副主编 | 吴 敢 | 黄 霖 | | |
| 编 委 | 卜 键 | 孔繁华 | 及巨涛 | 王汝梅 |
| | 宁宗一 | 卢兴基 | 田秉锬 | 孙 逊 |
| | 刘 辉 | 杜维沫 | 陆国斌 | 陈 诏 |
| | 吴 红 | 吴 敢 | 林 辰 | 周中明 |
| | 周钧韬 | 袁世硕 | 梅 节 | 黄 霖 |
| | 蔡敦勇 | 魏子云 | | |

前 言

徐朔方

《金瓶梅研究》的出版表明，这部小说存在四个世纪之后，如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有了供同行和读者内外沟通，发表研究成果，借以切磋、讨论的一块园地。

如果说它是人们争取已久，今天才得以付诸实现的产物，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但归根到底，它是时代也即历史进化的产物。

由于有一些刻露的性行为描写，《金瓶梅》从它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有形、无形的查禁。考虑到它对读者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它在中国小说史上所起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以及它本身同糟粕并存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它对明代戏曲创作及演唱的印证，以至它对晚明社会生活的广泛记录和反映，都是客观存在，都不容对它视而不见，或存而勿论。

特别是它在小说史上的承先启后作用，更值得注目。按照原有说法，它是我国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按照后起的一种说法，我国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无例外地都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它们由词话——话本整理写定，虽然最后加工整理的程度各有差异。其它小说只留下它们的早期话本，如《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它们后期较成熟的词话——话本都已不复存在。《金瓶梅词话》和它的崇祯本却是硕果仅存的后期话本，正好补足前三部小说版本演进史上所失落的一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它是小说发展史上留下的一块活化石。以上只是时下异说纷呈中的一种，借此聊备一格，

并不想如同《庄子》所说的河伯一样，“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金瓶梅》有节译或接近全译的外文版本，包括德、英、俄、法、日等语言，达十二种之多。它们的出版发行以及研究论著不比国内为少，其成就可以从《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中窥见一斑。

对这样一部名著，既没有充足的理由，也没有实际可能对它禁锢。

我们不主张让《金瓶梅》通行无阻地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发行，然而希望经过适当删节的《金瓶梅》向公众开放，而它的足本对业务上有需要的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应提供购置和阅读的方便。这完全是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使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对《金瓶梅》的研究处于同等的地位，以便交流和切磋。

无论对《金瓶梅》的创作年代、它的作者或写定者是谁以及对它的评价都可以而且应该自由争论。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创见，但别人同样有权利这么做。就国内大陆和台湾、香港以及国外的情况看来，由于近四十年的隔绝以及现在交流还不够畅通，自然形成各地区相对不同的小气候。大陆重视词话本，而国外早期译本都以崇禎本为依据，因此王世贞创作《金瓶梅》说以及小说影射时事说在大陆以外比较流行。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论。小气候也会有变化或带有不同的风向。各地区小气候的形成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制约，不是短期之内所能改趋而使之有较大的接近。每一说法后面都有各自所由来的文化背景。即使在同一地区，各人的禀赋和承受也并不完全相同。桔逾淮而变枳，樱花和海棠却可以连枝接叶而丰神各别。也许正因为各国各地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文化交流才有存在和加强的必要。如果世界大同不只是哲人的理想，现代科学必将作出论证，它只能是出于频繁而卓有成效的文化和经

济交流所产生的自然融合，而不是出于征服。在文化交流的无比广阔的领域中，我们愿意竭尽绵薄，为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同行提供方便，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合作和帮助。

目 录

回顾与瞻望

——《金瓶梅》研究十年……………刘 辉(1)

《金瓶梅》：小说家的小说

——“金学”思辨录之二……………宁宗一(44)

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黄 霖(60)

《金瓶梅》成书的上限……………〔港〕梅 节(84)

从两处更改看《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孙 逊(93)

《金瓶梅》这五回……………〔台〕魏子云(98)

关于《金瓶梅》抄本的问题

——敬复魏子云先生……………陈毓焜(141)

《金瓶梅》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吗？

——与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商榷……………陈 诏(147)

《金瓶梅词话》中歌曲的索引(提要)……………〔美〕柯丽德(163)

《金瓶梅》与中国酒文化……………田秉铨(166)

明清传播媒介研究

——以《金瓶梅》为例……………〔台〕朱传誉(180)

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与《金瓶梅》的悲剧主题

——论《金瓶梅》之二……………卢兴基(213)

《金瓶梅》艺术技巧的一些探索…〔美〕浦安迪著 沈亨寿译(235)

《金瓶梅》的文学风貌与张竹坡的“市井文字”说……………吴 敢(264)

回 顾 与 瞻 望

——《金瓶梅》研究十年

刘 辉

如果从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给董其昌信中评论《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算起，《金瓶梅》的研究，已近四个世纪之久。其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金瓶梅》刊刻问世前后的明代末期。当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不少文人学士围绕着它的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来探求其创作主旨，虽诸说不一，毁誉参半，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天地。二是有清一代，以李渔、张竹坡、文龙为代表，利用中华民族独有的文艺理论批评形式，对《金瓶梅》作了评点；从创作意图、深刻寓意，到艺术构思、细节描写，作了全面评价。尤以青年批评家张竹坡写下的总论、回评、眉批、夹注，总数不下十数万言，条分缕析，擘肌分理，独具特色。尽管他们的评点，带有主观随意、片面武断、牵强附会、琐碎拘密之嫌，但对《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光辉地位的确立，为古典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作出了丰功伟绩。三是清末民初至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先是前辈学者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对《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社会意义、创作得失，作出了精辟论述；复有各种文学史、小说史的专章评论，间以五十年代有关《金瓶梅》作者及成书过程问题的讨论。然而就总体而言，特别与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研究相比，显得十分岑寂。专论《金瓶梅》之文，

为数寥寥，这不能不与它长期以来就有“淫书”之恶谥而遭到禁锢有关。四是“文革”结束，我们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年，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繁荣阶段。与前一阶段的岑寂状态形成强烈的反差。有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粗略统计：建国前所发表《金瓶梅》论文不过三十篇，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大陆（不含港、台）仅仅十余篇，专著除属于资料性的《瓶外卮言》外，一片空白；但是短短十年，论文已逾数百篇，专著（不含《资料汇编》）十余种。^①单纯的数字，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期《金瓶梅》研究的生气勃勃之势，却无法表明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其全面、系统、深入。不论是《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过程，还是思想内涵、美学价值、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俗、语言，均全面展开，其广度与深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凌轹前人，成绩斐然。

国外的《金瓶梅》研究，是从张竹坡的《第一奇书》本被日、德、英、法等各种文字节译而兴起的，迄今《金瓶梅》的全译、节译本已不下几十种文字，《金瓶梅》早已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在国内《金瓶梅》研究处于相对岑寂之时，他们先走一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的《金瓶梅版本及其他》、《金瓶梅探原》及日本学者鸟晴久居的《金瓶梅版本考》等，都是《金瓶梅》研究的力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从徐朔方教授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中窥见一斑。1983年5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又率先召开了第一次《金瓶梅》专题学术讨论会。

面对着诞生在我们自己国度的这部小说名著其研究水平却落后于外国学者的不正常状况，每一个具有爱国热忱的《金瓶梅》研究者，无不忧思反侧，坐卧不安。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一代中青年研究者迅速崛起，有的地区甚至形成了《金瓶梅》研究群。他们在继承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不作依傍，独立思考，埋头苦读，积极进取，在短短十年，迎头赶上，作出了贡献。经过1985年和1986年两年在徐州召开的以及1988年在扬州召开的三次国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前不久在徐州召开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检验，目前国内的《金瓶梅》研究水平，不仅和国外的研究水平并驾齐驱，而且在有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新的突破。

一、进展与突破

《金瓶梅》研究十年，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有了新的突破呢？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作者之探索

《金瓶梅》作者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一个焦点，向为国内外学者关注。还在《金瓶梅》抄本流传阶段，它的作者就是一个谜。现知最早记载《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峻，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道：“相传嘉靖间，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②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中道则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③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谢肇淛又说：“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④他们既没有说出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均为“相传”，即传闻不实之辞。《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记载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较大：一是沈德符，他约在万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

属云。”^⑤二是晚出的欣欣子《新刻金瓶梅词话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一说“大名士”，一谓“兰陵笑笑生”，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大都以这两点为据，去寻求《金瓶梅》的作者，或对号入座，或假设推测，其中虽不乏望风捕影，却也开出了一串作者候选人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旂、李卓吾、赵南星、李渔……。由于清初的宋起凤和化名谢颐为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作序的张潮，公开为王世贞说揭橥：“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⑥“《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⑦《金瓶梅》为王世贞作，遂盛行一时。何况，这位“后七子”领袖，一代文坛盟主，确是嘉靖“大名士”的最合格人选；加之佚名《寒花庵随笔》、顾公燮《销夏日记》等的推波助澜，《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几成定论。其实，这些名副其实的只供消暑纳凉的闲话，经不住半点推敲和查证，以此来作为《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材料，本身就不严肃。待到1931年吴晗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及1934年所写《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才廓清了种种迷雾；同时鲁迅、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一说随之根本动摇。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人们才得以获见《金瓶梅》一书的原貌，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金瓶梅》不仅不是王世贞所作，而且也“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⑧《金瓶梅》集体创作说遂应运而生。是文人作家独创，抑是集体之作？十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正是由此而起步的。

力主《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长篇的研究者，在仔细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又提出不少新说，形成了旧说犹存，新说并起的热闹局面。迄今，《金瓶梅》作者的主名者已有二十余人之多。学术研究从来就是在诸说论争中求生存发展的，《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激烈论争，恰好是十年来《金瓶梅》研究兴旺发达的一个缩影。

早在六十年代初，中科院本《中国文学史》，在《金瓶梅》一节注文中提出作者是“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此书再版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又删去了这句话。据闻：此节文字由吴晓铃先生撰写。直到1980年，徐朔方先生写于1964年的《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发表之后，才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此文以及作者陆续写出的《金瓶梅成书补证》、《金瓶梅成书新探》，有一个共同的显明特点，即着眼于内证，从《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抄引李开先的《宝剑记》入手，博引旁证，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是，同样的史实和资料，通过搜集、整理、甄别、审查，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见仁见智，原是寻常之事；即便偶有以曲绳直，亦在所难免。徐文主论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而不是它的作者；而吴晓铃先生则认为是它的作者。青年研究者卜键，进一步详考李开先之生平行实与宦迹游踪，兼及谱系嫡庶之辨析，由《金瓶梅词话》成书于嘉靖后期，至词话本内容与《宝剑记》、《西厢记》之比较，从李开先的创作思想与《金瓶梅》美学思想的对比，到兰陵笑笑生的考辨，洋洋洒洒，十五章五十余节，写成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可说是“李开先说”的集大成者。尽管此著过于细密，易流于穿凿，琐碎难免附会，但在《金瓶梅》作者的探索中，却是一部新作，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1983年，张远芬同志在系列论文基础上汇为专著《金瓶梅新证》，论证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贾三近，山东峰县人，

峯县古称兰陵，与欣欣子所言“兰陵笑笑生”不谋而合；并认为书中多次提到的金华酒，就是产于峯县的兰陵酒，《金瓶梅词话》中的山东土白也多是峯县方言。此说一出，多有商榷。兰陵古代有二：一为山东峯县；一为江苏武进，难以定论。不可忽略的是：这毕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金瓶梅》作者的专著，自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讨论中，黄霖同志1983年提出的屠隆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说法之一。这位一生风流倜傥，混迹官场又被罢官，笃信佛道而又熟稔戏曲之作的屠隆，确是具备创作《金瓶梅》的多种条件，加之移家武进，与“兰陵”相符，而黄霖论证的核心，在于查出《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水秀才》所念一诗一文，出自笑话集《开卷一笑》。此集卷三题为“卓吾先生编次，一衲道人屠隆参阅”。卷一又有“卓吾先生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五《别头巾文》，更直署“一衲道人”。据此，认为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是一个人，并进一步推论笑笑先生即欣欣子所记“笑笑生”。自然，屠隆便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了。此说是从小说里寻找内证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论证亦为前人所未见，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引起一场争论。讨论愈细，持议与否定双方思考愈深，各自的疏漏也愈明显。且不说《开卷一笑》（又名《山中一夕话》）这类笑话文字游戏集的编刻，多系辗转相抄，书贾射利而为，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不能作为可信史料拈来就用，恐怕“屠隆说”的主要症结还在于：第五十六回正是沈德符所说：“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贋作矣。”^⑩并不是词话本的原作，而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贋品，似不可当作真品论证其作者。当然，这五回是不是贋作，沈德符的话是否可信，也有绝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另外，屠隆与

前面提到的第一个记载《金瓶梅》作者的屠本峻的关系，更不容忽视。几年前我已著文提及：“近年来有的同志，认为《金瓶梅》系屠隆所著，这就与屠本峻编次的这部《山林经济籍》以及他所写的这则跋语直接有关了，不能不在此提及。屠本峻与屠隆同里同宗，屠隆与屠本峻及其父屠大山关系又相当亲密，《山林经济籍》中也辑有屠隆的《婆萝园清语》，屠隆为屠本峻的《霞爽阁空言》所写序亦收在本书卷二十四中，更何况屠隆的儿子屠一衡还为《山林经济籍》写了序言。设若《金瓶梅》系屠隆之大作，屠本峻绝不会不知道，他更不必跑到金坛王宇泰那里，看他收藏的二帙抄本，亦断然不会写出‘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样的话来。仅此一点，屠隆之作《金瓶梅》一说，就难以站得住脚了。”^⑩

1983年5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od Roy）提交了题为《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的论文，胪列了三十条《金瓶梅》原文，论述其与汤显祖的关系，并就《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和汤显祖的生平行实作一综合考察，得出了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期内创作了《金瓶梅》的结论。同时，还怀疑《金瓶梅》的初稿，就叫《紫箫记》。其实，汤显祖是《金瓶梅》作者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早在几年前，笔者与同仁、师友交谈中，不少人都已提及，但真正诉诸笔端而又详加论证的却是美国学者芮效卫。就我所知，被芮效卫先生称为“当今汤显祖研究权威”的徐朔方教授，在他访美时，曾就此与芮效卫教授当面辩论过，后又著文质疑。^⑪

近期《金瓶梅》作者的讨论，除上述诸说之外，沈德符、冯梦龙、袁无涯、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也被研究者陆续提了出来。证据多寡有异，反响强弱不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与文人作家独创说并存的是集体创作说。围绕此说之争论，

近年来十分瞩目。较之1954年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发表后引出的讨论，无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可喜的进展。这突出表现在：不仅仅局限于《金瓶梅》一部小说，而是立足于整个明代成书的小说名著，来探讨它们共同的发展规律。

笔者所见不广，仅就个人涉猎，我认为最早指出《金瓶梅》是部集体创作这一问题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他在《续金瓶梅·凡例》中说得更清楚不过：“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续金瓶梅》第一回开篇，又作了进一步说明：“见的这部书（指《金瓶梅词话》）反做了导欲宣淫的话本。”他说的“前集”，就是《金瓶梅词话》。所以名为“词话”，是因为小说里“类有诗词”，“多用旧曲”；而且把这类“词话”径直称为“话本”，和宋元话本相提并论，真是一语破的，深中肯綮。

众所周知，宋元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底本”，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金瓶梅》亦在其列。此书既云“词话”，就厘定了它的艺术范围。所谓词话，是兴盛于元明两代的民间说唱艺术。词话，亦即话本，这一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它的本质特点，也就是丁耀亢所说的“类有诗词”，亦即《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所说的“吐谈万卷曲和诗”。可见曲和诗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词（含曲和诗）是可唱的韵文，话指说散，话本就是词话本的简称，“话本”之“话”，指的就是词话。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忽略了“词话”和“话本”是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称谓，因此往往把“话本”之“话”理解为只说不唱。此说并不符合现存宋元话本的实际，我们只要看看话本里出现的数量不等的诗词韵文和读一读《快嘴李翠莲记》这类话本，就可一目了然。这绝不可视为一个小小的名词解释，而是涉及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中国明代成书的长篇小说，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个词话的发展阶

段。根据明代不止一种记载，《水浒传》、《平妖传》的成书过程，都有过一个词话阶段，但《水浒传词话》、《平妖传词话》却早已失传不存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看到的只是它们不同的简本和繁本或接近原始刻本的残本或全本，唯有《金瓶梅词话》，可说是中国宋元明三代通俗长篇小说发展中唯一现存的词话本，是长篇小说词话本仅存的活化石，在中国小说史上弥补了一个空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

中国长篇小说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不少于宋元明三代。早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已经制订出三国故事的基本框架；另外，元杂剧的五十余种三国戏，场面恢宏，形象丰满，也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水浒传》、《西游记》成书亦然。

当我们勾勒了和《金瓶梅词话》几乎同时成书的长篇名著发展脉络之后，不言而喻，这些长篇小说绝对不会，也绝不可能是某一位大作家大手笔的个人独运，而是众多民间艺人、书会才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的最后成书，也必然是长期流传，世代累积的结果。为了揭示中国长篇小说这一独特的创作规律，经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概括，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我是完全赞同的。

正是在研究词话这一艺术形式特征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规律的基础上，细检《金瓶梅词话》作品实际，然后再得出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个结论，相对来说，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首先，《金瓶梅词话》中保留的可唱韵文之多，有目共睹。有的回文字不长，韵文所占比重却很大，如第八十三回，除回首韵文外，竟一连用了〔寄生草〕、〔雁儿落〕等七支小曲或小令，两首诗赞，一长段赋体韵文，就是明证。况且这一艺术形式，并非单见某一回或某几回，而是贯穿全书。我曾经作过一个粗略

统计：一部《金瓶梅词话》，其中曲、词、诗、赞、赋及其他俚俗可唱韵文，共599种，即便由几支单曲组成的长篇套曲，或长达十几面的唱词，也以一种计算在内。应当说，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由于词话本在刊刻这些曲、词、诗、赞、赋时另起一行，空下一格，醒目易见，便于统计，而细心的读者从它说散文字里面，仍然可以发现有大段韵文夹杂其间。试以第八十六回王婆领走潘金莲时，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为例：

王婆：“金莲，你休呆里撒奸，两头白面，说长并道短。我手里使不的你巧语花言，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儿蛋。你休把养汉当饭。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金莲道：“你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常言一鸡死了一鸡鸣，谁打罗，谁吃饭，谁人常把铁箍子□。那个常将席篾儿支着眼。为人还有相逢处，树叶儿落还到根边。你休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攢。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时衣，男儿不吃分时饭。自有徒劳话岁寒。”

这是典型的一例。证明说话人在说表时，亦琅琅上口，韵味铿锵。说唱成份这样多，气氛如此浓厚，用现代小说创作方法去衡量，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正是词话这一艺术形式制约了它必须这样办，说了一段之后就得唱，不分时间、场合，也无论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譬如，第七十九回描写西门庆临死之前，几度昏迷，竟还有气力唱出一支〔驻马厅〕的曲子；尽管吴月娘其时已悲痛欲绝，又竟能回唱一支曲子。虽然这两支〔驻马厅〕唱得那样心热耳酸，但都不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美学力量给读者心灵上以巨大感召，只能说是说唱者的婉转歌喉，给了听众音乐上美的享受。

其次，大量采录、抄袭他人之作。《金瓶梅词话》对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传奇作了大量采录。第一回开头就用了《清平山